



【书 评】

前苏联族群政治之鉴

——评瓦西里·季什科夫

《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

关凯¹

前苏联解体是 20 世纪国际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局之一。对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问题的作用与影响，国内外学界众说纷纭。季什科夫所著《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姜德顺译，2009，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提供了分析这一问题的独特视角。

季什科夫本人不仅是一位著名学者，同时也是前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联邦体制内负责民族工作的高官，曾任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部部长，现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季氏亲身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并参与了其中许多重大事件的处理，因而得以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对这段时期苏联境内各民族单位的变化形态、动员机制与博弈过程进行“参与观察”，诸多论断，颇有“局内人”的洞见。

季氏以“炽热的头脑”命名其书，一方面在暗示民族主义者偏执的狂热，另一方面也在揭示政治与知识精英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所扮演的煽风点火的角色。季氏不遗余力揭露批评之要点，即社会精英为谋一己之私，利用社会转型与制度缺陷，操弄民族意识，制造族群冲突。此为前苏联解体的圭臬。

在季氏看来，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出现的困境，首先来自于理论层面。

苏联的民族理论，脱胎于斯大林“四个共同”民族定义的刻板教条，强调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其理论实质是将民族本质化，突出历史与血缘之于民族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使“民族”具有生物学意义，从而为“民族至上”提供了“科学”依据。苏联按照这种原生论理论，实施“族体构建工程”，自上而下地建构族性（ethnicity），并采取生硬的赋名方式，区分“民族”和“部族”，创造出各族群的层级，使民族分类方法与政治权力分配挂钩，造成“哪里需要就在哪里杜撰民族”。同时，基于苏联高度政治化的学术环境，民族研究“直接表现为行使权力”，以官僚意志为核心，将“民族过程”解释为“合并与集成”，人为控制“民族”和“部族”的数量，通过人口普查、对民族志进行加工等方式，“把族性制度化民族”，并为每个民族创造出邦国地位，做出区隔化的制度安排。吊诡的是，苏联政府一方

¹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副教授。

面固化民族边界——在理论上本质化“民族”、在制度上承认“民族主权”，同时还试图创建“单一的苏联民族”这种理论学说。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尽管苏联的国家建设卓有成效，“绝大多数苏联公民都有相同（或者非常相似）的社会、政治甚至文化方面的价值观”，但这种同质化的“苏联民族”在社会层面却是一个脆弱的神话，当社会发生转型，在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运动冲击之下，特别是面对暴力的族群冲突，“苏联民族”的神话不堪一击，苏联的国家实体随之崩溃。其渊源之一，即在于理论之祸。

作为一个建构论者，季氏本人坚决反对僵化的脱离于社会现实的苏联民族理论。事实上，当代社会科学在民族研究上的主流理论，更多强调“民族”的主观性建构的特征，即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之类的言说。恰如季氏所言，“族性是社会方面建构起来并制度化的”，在所谓的“根本”因素与“主观”因素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僵硬的分界线，“这些因素不仅相互发生作用，而且常常是可以分离的”。

按照季氏的分析，前苏联地区渐渐生成的三种民族主义，都和苏联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有关。而撕裂前苏联的政治力量，就包含在这些民族主义之中。

第一种是“族裔民族主义”（或译“族群民族主义”）。在季氏看来，族裔民族主义“是一套过分简单但又强有力的神话，起因于苏联的政治实践，又反作用于这些实践”。季氏特别关注“理论和学说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如何被人们生成和滥用”，以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国际主义学说，又为何在苏联人民中事实上培育了民族主义情感”。其后果是，“被学术规定和政治指示施加影响，把民族当成生物性所决定的某种东西，这种观念十分强烈，以致不可能简短而轻易地加以改变和终止”。上述这些因素都是族裔民族主义在前苏联社会生成的条件。

季氏进一步写到：“‘民族归属’和‘为了民族效力’的思想，是族裔民族主义最权威的要素，因为它预先假定某个精英能够阐释本民族利益。在整个苏联，精英们在大多数族群中以‘本民族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电影制作人以及学者的面目涌现而出，所有这些都勤勉地参与构建本民族的神话。在这些颇有动员效果的神话中，最流行也最普通的一个就是关于某一民族的族体形成(ethnogenesis)神话，说的是某民族那辉煌的古老历史，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穿越而来。……几十年来，族裔民族主义的学说——以它让各民族自决包括脱离的至关重要的权利——在宣传中被鼓吹，并被包含在苏联的各种各样宪法中。”

季氏定义的第二种民族主义表现形式为“具有扩张主义倾向或压制倾向”的优势族群的“霸权型民族主义”，包括当前的俄罗斯政治也正在继续强化霸权型民族主义的地位。“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现在已耗尽它们的潜能，逐渐被民族主义的思想观念以其特有的俄罗斯姿态所取代。这种情况会朝着两个方向演变：排外的族裔民族主义，或者较为宽容的形式，即公民的爱国主义。”

第三种民族主义——“外围周边型民族主义”实际上也来源于苏联遗产，一些群体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获得了“自己民族的国家”，并实现自决权，如芬兰人、波兰人、鞑靼人以及格鲁吉亚人等。此种民族主义是由苏联的民族政策推行的，事实上构造出苏联中央政府对各民族的“宗主关系”。“正是莫斯科做出所有重大决定，从经济发展战略到关键的政治任命，莫不如此。而且这些决定的受益者们往往是非俄罗斯族各族体，或者至少是浸淫于俄罗斯文化中的资产阶级精英们。”这些“有名分”的非俄罗斯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保护地方上占优势的少数者，反对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和俄罗斯文化霸权，但在它们将要明确表达自己异议的情况下，也是毫不宽容地对待更小的少数者”。

基于这些认识，季氏本人反对“苏联解体命定论”。在他看来，前苏联的民族政策绝非仅仅是国家分裂的加速器，相反，它确实为前苏联的多民族社会带来了卓有成效的同质化(homogeneous)特征，这首先需要归功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阶级学说为前苏联社会“创建类同的(homogeneous)劳苦人民‘各民族’”提供了理论依据，并配合“单一的发展战略和强迫接受的来自中央的俄语意识形态宣传”，导致“在这个国家，出现了‘一个苏联人民共同体’这种说教并非偶然”。但一旦“极权主义失效之后”，苏联的民族政策的两面性就暴露无遗，它为各种

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合法性和制度性机会，从而为政治精英在社会转型期操弄族群政治留下了空间。

在苏联及其解体后的语境里，“族性”究竟是如何在前苏联地区的社会生活中运行的，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季氏的视角聚焦于社会转型。

正是因为僵化的苏联体制无法适应民族主义运动的挑战，以至于苏联解体被西方标榜为“各民族之胜利”。但实际上，民族主义不过是前苏联社会全面转型的一种促进剂，而非全部。作为民族政治学家，在民族问题之于苏联解体的影响上，季氏同时批判了俄罗斯和西方社会科学家对此的看法，二者都未在事情发生之前对苏联解体做出准确预言。按照季氏描绘的图景，苏联时期特殊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只是苏联解体的结构性诱因，而从政客到知识分子，各种社会精英在社会转型期为争夺政治利益对族群政治实施的操弄手段，才是苏联解体的现实动力。也就是说，真正的问题出现在精英层面，而非大众层面，后者不过是盲从之众。

所有专制体系最脆弱的政治环节是最高领导层的人际竞争，而在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权力竞争才是苏联解体的发酵粉。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最强大的政治对手就是叶利钦，而后者则以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武器。为打击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试图促成签署新的《联邦条约》，以图削弱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权力。而叶利钦的反击手段是利用民主化的机会，对着俄罗斯各民族自治单位高喊“你们能吞下多少主权，就给你们多少”，因而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戈尔巴乔夫。但随后，叶利钦却又不得不用他曾经挑战过的那种模式——和戈尔巴乔夫类似的逻辑，遏制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解体之后继续分裂下去的可能性。

事实上，1990年代俄罗斯联邦独立之后的民族政治博弈，始终是围绕着领土、资源、政治权力以及文化展开的，“族性不过是被当作是巩固团结和进行动员的政治工具”。无论是车臣领导人杜达耶夫关于“俄罗斯帝国统治者偷窃车臣资源”的言说，还是在环境问题上爱沙尼亚对抗苏联政府；从土地改革（集体农庄制转向个体农业）到“通过集体执行的暴力夺取异族的财产”，各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一方面适应局势，操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却也受到由此导致的民粹主义的冲击，在混合着各种利益的关于主权的争夺场上，时而呼风唤雨，时而进退失据，在冲突与争端之中身不由己地成为赢家与输家。同时，在季氏看来，领导人个人的行为也影响深远。如果1994年底之前叶利钦肯与杜达耶夫见面谈一下，哪怕仅仅是直接通个电话，车臣问题就可能最终不会发展到那么糟糕的地步。

正如车臣问题一样，精英操弄族群政治的社会后果之一，体现于后苏联时期中亚和高加索地区频繁发生的暴力族际冲突，季氏也以此为案例展开了分析。

中亚地区的五个国家实际上是苏联政府通过对民族志进行处理而生产出来的政治实体，它们“意外地且准备不充分地”获得了独立。对于前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季氏总结为“苏联民族政策可以在坚持一贯的集中化和政治迫害的同时，有助于进行笨拙的工业化和文化扶持，但这种政策的突出矛盾在于，它使处于外围的中亚可以日益期盼独立。”在书中，季氏观察的重点是在这些国家里俄罗斯人的命运，这些人，包括2500万俄罗斯族和数百万前苏联的其他民族——他们的前辈可以上溯到17、18世纪就居住在这里，在苏联解体后突然发现“自己成为自己国家的局外人”，于是，一场规模浩大的移民潮开始了，大量俄罗斯族移出这些国家。

对车臣-印古什冲突中的种族清洗行为，季氏强调，“在极权主义失效之后的社会中，温顺的大众受到操纵而卷入族际冲突”的原因，主要是精英的动员。领土争端、斯大林主义统治的遗产（“被遗弃人民”的情结）、族群精英的政治动员以及奥塞梯族对当地印古什族的刻板印象（“懒惰、阴险、不诚实”等）与戒备心理，都为北奥塞梯共和国发生的种族清洗埋下了火种，并经由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政府的策动而最终发生。

在吉尔吉斯的奥什州，1990年在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之间爆发了“暴乱型冲突”——季氏将其定义为“还不是在老谋深算的情境下，或者还未构成武装力量，或者还不是前线清晰的有组织长期战斗的暴乱型或大屠杀型冲突”。这场冲突起源于一种被季氏称为“社会偏执狂”



的恐惧社会心理有关。“焦虑与恐惧状态，甚至恐慌状态，显现于族际暴行的几乎所有组成事件中。吉尔吉斯族害怕乌兹别克族的程度，与吉尔吉斯族对乌兹别克族的惊吓一样严重。”

在对诸多理论和冲突问题做出分析之后，季氏回到现实的对策建议上。在族群政治如此复杂的前苏联地区如何才能建设起一个和谐社会，季氏的看法是需要促进一个多元化社会的生成。在季氏看来，“族性”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冲突的原因（换言之，“民族”之所以能成为“问题”），在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滥觞。显然，和谐社会的政治敌人是民族主义，而多元化社会恰是遏制民族主义的良药。

多元化社会的建设首先需要解决理论问题，需要“拆解旧学说并寻找新规则”，特别是要消除俄罗斯是“一个专制的、以俄罗斯族为主导的中央”的帝国主义之说，新的国家学说必须强调“俄国并非俄罗斯族的‘民族国家’，它的任何部分也不是任何族群的独占财产”。在国家构建的过程中，需要促进双重的忠诚，一个人既可以是本民族的一员，也可以是俄国人的一员，两者并不相互排斥。在实践上，新的民族政策必须“在非暴力阶段调节族性”，为族群冲突提供预防性干预。具体做法是要通过联邦制分权、加强地方自治等手段促进文化平等，缩小族群之间结构性差异，避免贫富悬殊，唯此方能令俄罗斯摆脱族际冲突。

闭卷反思，季氏这部著作对于中国读者的吸引力，无疑更多来自于一种比较的视野。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制度模仿榜样，苏联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仅从高度相似的理论话语模式，即可管窥全貌——迄今为止，我国的官方民族定义依旧在重复斯大林主义话语，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优惠政策等制度安排也显示出明显的苏联印记。但在实践层面，由于历史传统与国情的不同，中国并没有全盘照搬苏联模式，而更多只是在理论和制度安排的形式上承袭了苏联传统。实际上，我国民族政策的内在逻辑，不仅包含了苏式民族政策的某些基因，也始终不缺少对数千年统一多民族帝国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我国除了一些藏族自治州之外，绝大多数的民族自治单位在人口结构上都是汉族占多数，而并未如苏联的制度安排那样将“民族”与地域的边界同一化。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季氏的描述与分析，于中国意涵隐喻之处，俯拾皆是。特别是经过数十年的理论传播与制度实践，苏联经验已经在涉及民族的诸多领域被中国本土化。由此导致在民族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的内在不协调，始终困扰着我国社会。例如，以当下观之，我国开展的“民族团结教育”，一方面以促进文化尊重与文化宽容为己任，另一方面却在传播原生论民族知识，描述“民族”的“血缘命定说”；另外在我国公民身份证上，人人被注明“民族成份”，一方面为保障少数民族权益提供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却将基于“民族过程”做出鉴别的武断的社会分类方法，固化为具体社会成员的具象身份边界；在族群冲突上，季氏所讨论的精英动员结构是社会冲突事件构成之必然要素，但在我国却迹近学术禁忌，鲜见公开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诚如季氏所言，解决民族问题的出路在于多元化社会的构建，而我国处理民族问题仍然高度依赖自上而下的单一路径，而此单一路径之风险，恰为前苏联族群政治的前车之鉴。

族群政治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研究领域。季氏特别劝告知识分子理应恪尽职守，不要傲慢地以“科学地管理社会”为借口过度参与政治，也不要再在俄罗斯式的“命定说”之中流连于自己陈旧的民族主义立场。这个看法展现出季氏作为政治人物的担忧：知识分子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建构民族主义，而是相反。但在我国，仍然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或站在主流群体的立场，或站在少数群体的立场，困于各种或隐或显的民族主义观念，难以实现知识建构上的真正超越。

无论如何，季氏的著作终究是一家之言。尽管季氏在书中未置一词，但其实际应用的理论范式主要是资源动员理论。这造成了本书明显欠缺对社会形态的详细分析，由此涉及到一些悬而未决的重要理论假设：民族主义是否完全是由精英操弄的政治游戏，民间社会是否在运动之中只是一群被动野蛮的乌合之众？没有大众人心思变的共识，民族主义又如何能够成为促发社会变革的炽热火焰？这些问题，却非季氏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视角所及。

